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敦煌遗书因何被封？



敦煌 17 窟藏经洞

20世纪初,冷冷清清的敦煌莫高窟再度为世人所瞩目,因为看管这个地方的一个姓王的道士从中发现了大批的经文和绢画。

作为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的敦煌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随着商路的开通,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纷纷云集在敦煌。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宋代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献,有官私文书,有儒学经



藏于敦煌莫高窟的金刚经

典，还有藏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公元5~11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谜。有人持“废弃说”，认为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还有人持“避难说”，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被有目的地藏起来的。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夺这批宝物的外国人。他对其中的物品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写本和绢画及佛教法器，都是宗教用品，但都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来。同时，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所题写的



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斯坦因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11世纪初。主张“废弃说”的还有日本学者藤枝晃。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因为图

立佛图 敦煌石窟 唐观音造型比例匀称，体态端庄，手提净瓶，立莲花上。面部、手脚简洁，净瓶、莲花瓣均微施晕染，衬托出石榴裙更加鲜明，线描简练，笔力稳健。



天龙八部 敦煌石窟 唐

天龙八部是佛教中的神灵，图中分别以金翅鸟、雄狮和蟒蛇等头饰标示他们的身份。头饰金翅鸟的迦楼罗是取龙为食的金翅鸟王，摩侯罗迦是大蟒神。作品充分运用线条的造型功能，极为生动地描绘出了三位神将各自不同的形象、气质和威风。

书馆的重新布置，所以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公元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他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在唐代“安史之乱”期间，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敦煌。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建立归义军举行起义，摆脱了吐蕃的控制。此后，敦煌又一次被沙州的回鹘占领。公元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随后又被沙州回鹘赶走，在公元1068年又被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了。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所以藏经洞中的藏品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韩熙载夜宴图》成因之谜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流传于世千多年来，摹本迭出，渔樵佳话亦不少。仅关于它的成因故事，就有几种观点：宋人的《宣和画谱》说，李煜命令顾闳中，夜窥韩第并作此画，仅是为了满足那位南唐后主“欲见(韩)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的好奇心。宋陶岳撰《五代史补》时却说，李煜

派闳中画出韩熙载“不羁”之态的目的是把此画赐给韩，“使其自愧”。元代《画鉴》等书的作者又出新编，认为李煜派顾闳中夜窥韩第并作画，既非好奇，也非规劝，而是想在上调韩熙载当丞相前，了解一下此人的生活作风，且派去“窃窥”和后来作画的不止顾闳中一人，还有一位叫周文矩的，也是御前大画家。《画鉴》的作者汤堂说，他曾亲眼见过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

事实上，这些传闻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揣测的。李后主时代，韩熙载已是兵部尚书兼充勤政殿学士，其私人府邸岂是外人可“窃窥”的？再说，李后主即使想了解韩熙载私生活情况，也用不着费这么多心机，因为韩熙载早年是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 顾闳中

有名的“知礼”大臣，曾任知制诰(专为皇帝理文书)，为人“素高简，无所卑屈”，不饮酒，不贪财，写得一手好文章，多才多艺。晚年，见南唐气数已尽，不愿做亡国之

君的陪葬品，以蓄伎、放荡“自污”，甚至装乞丐上街说唱，闹得世人皆知，这难道还需要李煜派人去打听么？如果说《韩熙载夜宴图》的成因与韩熙载不能成为丞相有关，笔者倒同意这一猜测：此画也许是韩、顾(或周)的袖里之作，是韩熙载导演的“自污”剧目之一。要知道他是一位史称“隶书与画皆隽绝一时”的著名画家。

有学者认为，这幅名画展现的不是历史事实，有一桩鲜为人知的历史冤案隐藏在背后。

他们依据的是朱仲玉的《南唐演义》一书记载的说法，据载：韩熙载是南唐时有名的文人，他生性刚正不阿，为人从不虚假委蛇，敢于直言。此人平生不善饮酒，略饮一点便会面红耳赤，心跳不止，更不至于通宵进行宴饮。那么，这幅《夜

陶制敷彩披云肩女立俑 五代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 顾闳中
图中击鼓作乐者就是顾闳中笔下的韩熙载。

宴图》是如何来的呢？原来，当时南唐李璟在位时，以宋齐丘为后台的“五鬼”(五个奸臣)把持朝政。他们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胡作非为。韩熙载力劝李璟远小人，近良臣。“五鬼”因此恨透了他。为了打击韩熙载，“五鬼”一面设法收买了当时的大画家顾闳中，让他作画造谣韩熙载，一面又到处散布不利于韩熙载的各种谣言。顾闳中为了画得像，颇费了一番心血。他为了能够随意出入韩府，以便描画韩府的人物、景色及建筑，不得不先装出一副与韩熙载要好的样子，然后就照着宋齐丘家宴会的场面铺陈作画，经过一番移花接木之后，终于绘成一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千古名画流传至今，谁能猜测出它表现的竟并非历史事实，甚至还包藏着一伙奸人的祸心，使韩熙载蒙受了千年不白之冤。



三寸金莲——谁创造了缠足恶俗？



仕女照 清
两位仕女的小脚清晰可见。



绣花鞋 清

缠足，是封建时代摧残妇女、娱乐男性的一种恶俗，曾经使无数妇女尤其是大家闺秀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在近代的民主革命中，禁止缠足，放脚，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妇女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又是何人首倡此种恶俗，却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妇女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为了迎合男人的情趣、满足男人的欲望，妇女无论作出多大牺牲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楚宫之腰”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诗经》中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姗的意思。窈纠，形容走路好看的样子。张平子在《南都赋》中也写道：“罗袜蹁跹而容与。”总之，古代妇女走路以缓慢行走移动为美；反之，不但不美，也不符合封建礼仪。缠足的发生，大概主要是基于这一点，但究竟始于何时呢？又是何人首倡呢？一种说法认为：妇女缠足开始于五代。持此论的人大多引用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的一段记载：南唐王李煜有一宫女叫做官娘，轻盈善舞，以帛缠足，使之纤小如新月一般。她穿着白色的袜子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翩翩起舞。以后被其他人所效仿，开缠足之先河。到了宋代，妇女缠足的风气已经相当盛行。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理宗时，宫女们由于缠足，两只脚变得纤小，被人称为“快上马”；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记载：宣和末年，妇



贵妃出浴图 清 康涛

女缠足穿的一种尖底鞋，称为“错到底”。徐积在《咏蔡家妇》中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这样的诗句。苏轼的一首《菩萨蛮》，极言当时妇女脚小的程度：“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的学者认为：“缠足的开始至少不迟于唐代”，也就是说，在五代以前就有了。他们引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所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后，当地有一位老妇人因为捡到杨贵妃的袜子而致富。她的女儿叫王飞，还拾到一双雀头履；上面嵌有珍珠，履仅三寸长。王飞将这双鞋奉为异宝，从不肯轻易给人看。据此，推论出缠足在唐玄宗时就存在了。《群谈采余》中有咏叹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事凌波去不远，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记载了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来，

为怀念杨贵妃曾经写过《罗袜名》，诗中有“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之句。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对女人小脚的描写。例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花间集》中的“慢移弓底绣罗鞋”等等，反映了当时妇女已经缠足并且成为一种风气。清代内地有人到西藏，发现当地的灯具形状很像弓鞋，被称为“唐公主履”。唐公主，指文成公主。有人便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

缠足不迟于唐代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有人指出，若要缠足，必须以裹脚布层层裹住，这样便不能穿袜子。马嵬坡的老妇人既然拾得杨贵妃的袜子，可见当时还没有缠足。郭若虚的《图画见闻记》中说：唐太宗命令所有的宫人穿红锦鞞靴，这是一种袜筒很高的靴子，缠足的宫人，很难设想能穿着这种靴子行走。所谓“慢移弓底绣罗鞋”只是形容鞋底为弧形，鞋尖向上弓曲，就像现代的女式鞋中的一种款式。《宋史》中记载：“韩维为颖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此舞鞋？’”清代的袁枚也认为弓鞋仅仅是舞鞋而已。还有人引用唐代韩偓《厶子》诗中“六寸趺圆光致致”之句，说明当时尚无缠足恶习。唐有大尺和小尺之分，大尺相当今天的0.985尺左右，小尺相当0.82尺左右，由此推断，当时的6寸之脚也不能说很小。

《丹铅总录》认为缠足始于唐代，但《丹铅总录》一书的作者是明代的杨慎，杨慎写此书时正发配到云南充军，疏于考订，书中的讹误不少。因此，给我们揭开缠足起源之谜又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其首倡之人是谁，至今仍是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宋真宗年间的“天书”之谜



宋真宗像

北宋真宗年间，据传有“天书”突现泰山，乃降“祥瑞”。此事是真还是假，已成为千古之谜。



岱庙天贶殿 北宋

史载，宋辽建立“澶渊之盟”后，畏敌如虎的宋真宗回到开封。在宋辽对峙的情况下，宋朝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权呢？奸臣王钦若欺骗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而今不如大搞符瑞，请天命以自重，戎敌便不敢轻视宋朝了。”他建议宋真宗“封禅”，说这是“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这正合崇尚迷信的宋真宗之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想东封泰山，任命王旦作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作经度制置使，陈尧叟、冯拯分别作礼仪使，宦官周怀政负责在泰山营建行宫，为东封作有关的准备。此时王钦若上奏，说自古以来，必须天降祥瑞，才能封禅。祥瑞即指河出图、洛出书、醴泉涌、甘露降、芝草生、佳谷现等种种灵异之事，据说乃上天有意降下的吉祥征兆。真宗正为难，王钦若又道，无人知晓上天何时降下祥瑞，所以祥瑞亦可人造。《易经·系辞》所载河图洛书并非实有其事，不过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心领神会。

正月的一天，宋真宗对大臣们说：“朕于去年十一月在梦境中看到仙者，说这个月会有天书出现在泰山。”几天后，王钦若对宋真宗说：“泰山脚下有醴泉涌出，泉旁出现了‘天书’。”事实上，这是王钦若在迎合真宗。当时还在修建行宫的周怀政，却拿着自造的泰山“天书”没日没夜地赶回京师，献给真宗，宋真宗亲自到含芳园奉迎泰山天书，还让送天书的功臣周怀政得到了高官厚禄。此

“天书”为一书卷，上有泥封、丝结。内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等等善祷善颂之语。意为大宋江山永不倾倒。天瑞即降，十月，真宗开始东封，周怀政和皇甫继明拿着“天书”在前面，真宗在大批侍卫保护下，经过澶州、郾州来到泰山，到了山门，因为山路崎岖危险，只能下去走。登上岱顶，祭祀了昊天上帝，而



泰山玉皇顶

古代帝王封禅之处或为自旌表功，或为祭祀祈祥，或为表继承帝祚之意，每次封禅，无不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碧霞祠香亭 北宋

公元1009年，宋真宗敕建碧霞祠所筑。

且将“天书”陈放在圆台的左边，祭礼结束后，群臣高呼万岁，声音回荡在山间。下山后真宗又宴请大臣们，群臣皆加官晋爵。

就在满朝文武庆贺“封禅”时，有大臣劝告真宗节省开支、勤于政事。但真宗不听劝阻，执意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率领文武百官到河中府汾阴祭祀后土。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真宗说他又梦见玉皇大帝授予“天书”。于是大设道场，在京师建景灵宫，供奉玉皇大帝。一时间，朝廷内外乌烟瘴气。

宋真宗整日不问政事，热中于祭祀天地鬼神的迷信活动，这标志着北宋上层机关腐化，政治趋向形式化，北宋自此埋下了走向衰落的隐患。公元1126年，金国率兵南侵，掳走徽、钦二帝，宣告了北宋的灭亡。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怒发冲冠凭栏处——《满江红》作者之谜



刺字报国 年画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但是，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却对《满江红》的作者是否是岳飞提出了质疑。

余嘉锡认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从未见过此词，但却突然现于400年后的明代中叶，不能不让人生疑。同时，收录者对此词出处一无所言，搞得《满江红》像是来历不明的词。再说，岳飞之子岳霖和孙岳轲，费尽艰辛搜

求岳飞遗稿，但他们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却未收录这首《满江红》，31年后重刊此书时，仍未收入该词，这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所作，而是明人的伪作。

赞同余嘉锡看法的夏承焘还就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加以研究，而不是补充论断。夏认为，贺兰山位于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而不是金国地盘。岳飞率兵直捣的黄龙府，是在今吉林境内，“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

向乖背如此！”夏承焘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就常从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只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的。所以这首词出现于明代，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出了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1980年9月10日，台湾省《中国时报》发表孙述宇的文章，它主要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质疑。孙认为《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作过的

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婉转低徊、失望惆怅，两首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不像出于同一人之手，因而也怀疑《满江红》的真伪。但是：

第一，贺兰山同“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可用作泛称，岳飞就是把贺兰山当作黄龙府。1980年12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苏信的文章，认为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防御西夏的。这种对峙局面直至真宗、仁宗贿赂求和才暂时安定下来。岳飞当然熟悉50余年前的这段历史，《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很可能就是借指敌境，不能简单地当作违背地理常识。

第二，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在文学史上是有先例的。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湮没900余年才看到全文。

有人还结合词句，根据史实，考证出岳飞写《满江红》的具体时间。岳飞30岁（公元1133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故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岳飞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其真实感受，于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满江红》词究竟是否出于岳飞手笔？论者意见不一。不过，即使是怀疑《满江红》为伪作者，也无法抹杀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不管是否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



岳飞参花图轴 清 吕焕成



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宋

宋陵武将俑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为什么十三陵中十二陵上都无碑文？



明十三陵

在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十二陵没有碑文。这究竟是为什呢？

在这十三陵中，只有明成祖朱棣的石碑上有碑文，这块长陵石碑，正面上刻有“大明长陵神功神儒碑”字样，下刻有朱棣儿子明仁宗亲自题写的为其父歌功颂德的三千余字的碑文。既然十三陵中的第一陵有碑文，其余十二陵为什么不刻上碑文呢？

顾炎武在访问十三陵之后，写出了《昌平山水记》，他说，传说嗣皇帝谒陵时，问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什么无字？”大臣回答说：“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而《帝陵图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帝陵图说》里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皇陵碑记，都是



长陵螭龙碑

大臣们的粉饰之文,不能教育后世子孙。”他这一批评,使翰林院的学士们再不敢写皇帝的碑文了。后来,写碑文的任务,便落在嗣皇帝的肩上。所以孝陵(太祖)碑文是成祖朱棣亲撰,而长陵(成祖)的碑文,是明仁宗朱高炽御撰。

但明仁宗以后各碑,为何嗣皇帝不写了呢?依照这种说法,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了嘉靖时才建,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建成,当时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文,可是嘉靖帝迷恋酒色,又一心想“成仙”,哪有心思写那么多的碑文,因此就空了下来。

世宗以外的各皇帝,看到祖碑上无字,自己也就不便只为上一代皇帝写碑文,但如果都写的话,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因此,一代一代的皇帝传下来,就出现了这些无字碑。实际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不加以粉饰,他们所谓的“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因而这些皇帝干脆不写了。

还有人认为,这些皇帝的做法是效仿武则天。因为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人,“无字碑”立得真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些皇帝们知道自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同时肯定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得好坏都是难事,因此才决定立“无字碑”,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不管这些说法怎样,到现在,这些无字碑还立在十三陵中,同它们身后的皇帝一起,真正是做到了“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明孝陵神道旁的石像生



定陵神功胜德碑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永乐大典》正本流失何方？



《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且最全面的一部百科全书，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书。明代永乐年间，明

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前后用了5年时间编辑《永乐大典》，参加编写、撰稿、圈点的文人多达3000多人。《永乐大典》全书共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3.7亿字。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在嘉靖年间重录之后，它的正本已丢失，委实奇怪。后人的有关记载又众说纷纭，而且以讹传讹，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重大谜案，至今也没有形成定论。后人对《永乐



《永乐大典》书影

皇史宬内景



北京皇史宬外貌

皇史宬是现存最古老、最大的珍藏文化典籍的档案库，修建于嘉靖年间，整个建筑由皇史宬门、主殿、东西配殿和平御碑亭组成，四周环以红色高墙。主殿为砖石仿木建筑。



朱棣像
明成祖朱棣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组织人编辑了《永乐大典》。

大典》正本下落提出了种种看法和疑问。

有一种看法认为，随明世宗将此典殉葬于永陵。理由有三条：其一，从明世宗厚爱《永乐大典》来看，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不过明孝宗、明世宗两人。明孝宗曾命录《大典》药物禁方赐御医房诸臣。和孝宗比，世宗则更爱《大典》。据《明世宗实录》载：他“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中失火，世宗连夜多次下令抢救《大典》，之后又决定“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视为珍宝，所以正本极有可能为其殉葬于永陵。其二，在明代，有用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习惯，如60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檀墓，发现殉葬的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70年代上海郊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时间很长，又极爱《大典》，用《大典》正本殉葬的可能性自然也极大。再者，从永陵的建筑特点来看，其工程甚为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将《大典》正本殉葬的可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典》正本藏于皇史宬夹墙说。此说以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为代表。王先生对《永乐大典》素有研究，他始终认为“正本没有亡毁，我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皇史宬是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专门存放《实录》、《圣训》及《玉牒》等的皇家档案库。而皇史宬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用砖石修葺，殿基耸出地面，具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因此，《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还有一种看法是《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坚持这一看法的人很多，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 永乐大典 前言》为代表。郭沫若说：“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

由于史籍没有明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后人也在此问题上又有种种猜测和臆想，所以正本至今下落不明。要弄清它到底行踪何处，看来只有借助考古发现了。



解缙像

《永乐大典》内页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奇书出奇女——潘金莲在历史上实有其人



《武松打虎》壁画 清

大家都很熟悉武松杀嫂的故事，潘金莲也成为人们心目中淫妇的代名词。她与西门庆私通，将丈夫武大郎害死，最后被小叔武松杀掉。年轻貌美、口齿伶俐的她其实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反面人物，读者们也非常关心历史上是否真有潘金莲其人。

现存最早的关于潘金莲的故事的两本书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但《水浒传》、《金瓶梅》两书中描述的潘金莲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水浒传》小说创作于元末明初，作品中潘金莲是一个私通奸夫害死丈夫的淫妇，同时也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便是造成武松杀嫂这一悲剧的主要根源。

《金瓶梅》则创作于明代隆庆、万历年

间，潘金莲以一个残忍、刻薄、嫉妒、说谎、毒辣的淫妇形象出现于读者面前。这里的潘金莲由一个丫头变为恶霸西门庆的帮凶。她比《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更坏。潘金莲的形象在评话、戏剧舞台上，与小说相比，不同之处也比较多。

五四运动后，反封建和对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追求影响了欧阳予倩，他于1926年创作了五幕话剧《潘金莲》。剧中把潘金莲写成一个聪明伶俐的美丽丫环，她敢于反抗张大户的淫威，被逼与武大郎成婚。横遭摧残的她就此产生了变态心理，在西门庆引诱下，才谋杀了丈夫。她是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道德观念迫害下的受害者，值得人们的同情。剧中潘金莲曾这样说：“我想夫妻不相配，拆开了再配过，又有什么要紧！”这是作者思想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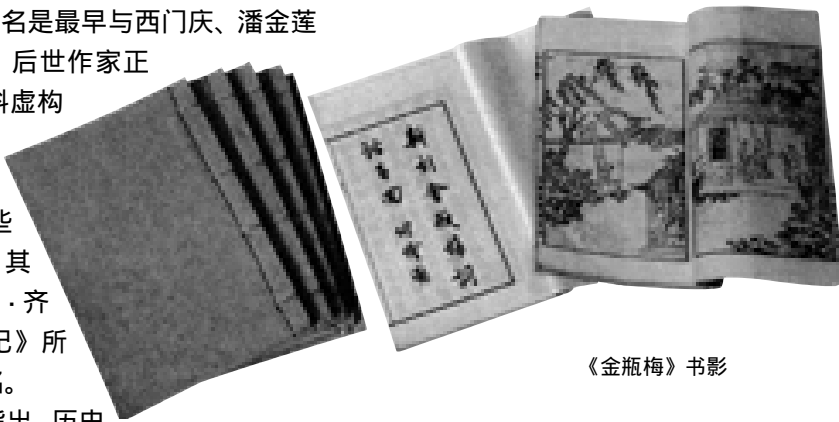
荒诞川剧《潘金莲》上演后，大家都非常关心。有人认为：根据各种艺术作品的不同描写，她是作家笔下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因而各种文学作品中的潘金莲的形象并不一致。在《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中

出现的地名、人名是最早与西门庆、潘金莲有关系的名称，后世作家正是根据这些材料虚构了西门庆、潘金莲的形象。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人名是虚构的，其根据便是《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所记的地名、人名。

但也有人指出，历史上潘金莲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母系后裔。根据这个记载，既然连母系后裔都有，那么，按理来说，潘金莲应该是确有其人。

第三种说法则综合了前两种说法，认为历史上确有潘金莲真人真事，而后再通过传说的渲染，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才成了各种文学作品所取材描写的典型。文学家的加工创作，使其笔下的潘金莲与历史上的潘金莲距离越来越远了。

不论历史上是否确有潘金莲其人，也不论应该对潘金莲同情还是唾弃，不能否认的是，潘金莲的出现，使文学上又多了一个典型形象，多了几段有趣的故事。



《金瓶梅》书影



春庭鸣鸟图

此图描绘主人于白日肆无忌惮地调戏丫头的场景。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金瓶梅》自明万历年间刊印以来，一直被历代官方严禁，有人誉之“奇书”，有人斥之“淫书”。但不管是毁是誉，《金瓶梅》的知名度恐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占鳌头的。这么一部几百年盛名不衰被译为十几种文字流传全世界的大禁书，使历代众多学者为探究其作者是谁费尽了周折。

《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古今学者争论不休，400年来依旧是个谜。

最为可靠的说法是其作者为王世贞，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大文学家，至今仍有很多人持此观点。

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

梅》全书对照，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很相符，《金瓶梅》中就有王世贞的影子，所以研究者都认为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另一种说法是“屠隆说”。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通过对这一新版本的考辨，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查阅之后，推翻了从前的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说法。

而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



《金瓶梅词话》的版本

《姑苏繁华图》(局部) 清繁华的市井生活当中，隐藏着了一位奇才，至今难以窥见真貌。